



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朱東潤題



顧易生
蒋凡 著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顧易生 蔣凡 著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一

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簽 朱東潤
責任編輯 鄧韶玉

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一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顧易生 蔣凡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5 印張 20.75 字數 425,000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ISBN 7-5325-0687-8

I·422 定價：9.65 元

說明

《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是我們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中的一個分卷。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共七個分卷：一、《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二、《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三、《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四、《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五、《明代文學批評史》，六、《清代前中期文學批評史》，七、《近代文學批評史》。全書有大致統一的體例，但照顧到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各卷也有其特點。多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規模比較宏大，力求較為全面地清理各歷史階段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對曾有所建樹的批評家與論著進行科學的評價，並努力發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豐富多彩和燦爛成就，總結其經驗與教訓，為文藝理論研究和創作提供借鑒與參考，為繁榮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服務。多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較之我們過去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已列為全國高校文科教材），體例相近，但內容方面則有較大的發展。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老前輩、老專家，我校教授郭紹虞、朱東潤兩位先生，對於本書的編寫，都深表贊同。朱先生還為本書及各分卷題寫了書名。郭、朱兩先生不幸於一九八四年六月、一九八八年

二月先後逝世，不及看到此書的出版。在此謹致深切的悼念。

先秦兩漢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開闢鴻濛的時期，許多有關範疇的提出都富有創造性，而且對以後歷代文論的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然而，由於其時「文」的觀念還是相當寬泛的，文學思想常與哲理、政治、文化、社會倫理以至語言、藝術思想渾融一體，這就決定先秦兩漢的文學批評有着不同於其後各代的内容與特點。本卷力圖從多角度、多層次對當時許多古籍如《詩經》、《尚書》、《國語》、《左傳》、《易傳》、《禮記》及諸子百家的思想資料進行調查研究，對習見的材料進一步重新認識，並致力於探索未闢的蹊徑。例如對先秦儒家文論，注重總結其多方面的成就，揭示其崇古口號中的創新意義和在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教化功能時對它形成的某種束縛；對道家文學思想作了較多新的闡釋，分析其否定文藝之論的心理、社會因素，展示其獨特的審美理想與涉及創作內部規律的精微識見；對墨、法諸家，也在剖析其「非樂」「重質輕文」的思想實質和政治經濟原因的同時，顧及他們在辯說藝術、著論方法等方面的理論貢獻；選為屈原、《呂氏春秋》分別闢置專章，着力抉發屈原崇高的愛美旨趣與文藝欣賞觀點以及他「發憤」、「抒情」、「陳志」的創作思想。作為春秋戰國學術文化發展黃金時代的百家爭鳴，容各有偏勝，自具獨創精神和鮮明特色，共同構成羣星燦爛的壯觀，因而本書先秦編對它們大都作基本肯定的評介。末後則表彰了呂不韋迎集諸家文士、容納羣言著書立說之舉，而於秦王朝禁燭著作言論的後果深致感歎。說到兩漢，前人慣於籠統地稱它是儒家經學鼎盛時代，扼殺文學藝術的發展。

果真如此，則蓬勃發展的先秦文論，陡然跌入黑暗深谷，歷經漫長的四百年後，又突然迎來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發展的新曙光，這種說法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本書兩漢編特從思想文化運動的客觀史實出發，力矯「斷裂」舊說，闡述漢代文論以其特有的形態循序漸進，分階段地發展，終於不負歷史使命，完成由先秦向魏晉南北朝的過渡。文學自覺的種子已經埋伏於兩漢，漢人實開啓文學批評新潮來臨之先河。我們在考察先秦兩漢文論史料時，務求理解其基本涵義，試同其時代和論者的哲理等思潮作有機聯繫，揭示它們的歷史地位和淵深流長，以期比較全面地描繪出這階段文學批評的特殊精神風貌。然其中不少問題尚屬初探，限於編者水平，這工作遠未做好。

《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中的《先秦文學批評》由顧易生執筆，《兩漢文學批評》由蔣凡執筆，楊明、鄒國平參加了部份工作。卷中約有半數章節，曾請周勳初教授、侯敏澤研究員、徐中玉教授、張少康教授審閱，《先秦文學批評》的部份初稿內容曾與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與研究生交流，獲得不少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本卷在內容、體例、結構安排、表達等方面的不妥以至謬誤之處，歡迎讀者提出批評意見。

王運熙 顧易生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於復旦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

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目錄

第一編 先秦文學批評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詩經》《尚書》《國語》《左傳》中所反映的文學觀念·····	三五
第三章 儒家的文學思想·····	四九
第一節 孔子（附《易傳》）·····	四九
第二節 孟子·····	一〇〇
第三節 荀子·····	一三三
第四章 道家的文學思想·····	一五二
第一節 老子·····	一五三

第二節 莊子	一六六
--------	-----

第五章 墨家的文學思想	二三三
-------------	-----

第六章 法家的文學思想	二四五
-------------	-----

第一節 商鞅	二四五
--------	-----

第二節 韓非	二五六
--------	-----

第七章 屈原(附宋玉)的文學思想	二八六
------------------	-----

第八章 呂不韋《呂氏春秋》(附李斯、嬴政)的文學思想及其他	三〇六
-------------------------------	-----

第二編 兩漢文學批評

第一章 緒論	三四三
--------	-----

第二章 西漢中期以前的文論發展	三七三
-----------------	-----

第一節 《禮記·樂記》及其他	三七三
----------------	-----

第二節 《毛詩序》及三家詩論	三九八
----------------	-----

第三節	《淮南子》及劉安	四二四
第四節	董仲舒	四五一
第五節	司馬遷	四七二
第三章	兩漢之交的文論演變	五〇三
第一節	劉向(附劉歆)	五〇三
第二節	揚雄	五二五
第三節	桓譚	五五六
第四節	王充	五七五
第五節	班固	六〇六
第四章	兩漢文論的尾聲	六三七
第一節	王逸	六三七
第二節	鄭玄	六四七

第一編 先秦文學批評

第一章 緒論

先秦時期的文學批評，是我國豐富多采的文學批評發展歷史的萌芽，雖不成熟，却蘊蓄無限勃勃的生機。

本書所謂「文學批評」，包括文學觀念、理論、具體的文學批評、鑒賞以及其他有關文學理論批評的思想資料。其所以統稱為「文學批評」，是根據約定俗成以求簡括（一）。當然，我們並不反對將文學研究的各部門作細密的區分。

本編所覆蓋的文學批評思想資料的範圍更為廣泛，這是由先秦時代「文」和「文學」這概念的廣泛含義所決定的。

中外古代都曾將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及文獻統稱為「文學」，而論者或尚以其未包括口頭文學

爲不足。我國古代文字的構造，象徵不同綫條、色彩的相錯。《國語·鄭語》云：「物一無文。」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云：「經緯天地曰文。」《易傳·繫辭下》云：「物相雜，故曰文。」都體現了這一原理。由此，自然界的森羅萬象和人類社會的諸種道德倫理規範、禮儀典章制度，言論文辭著作，詩歌音樂舞蹈，繪畫編織等文學藝術和工藝美術，都可謂之「文」，正如劉師培《廣阮氏文言說》云：「三代之時，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謂之文。」這裏體現樸素的對立統一藝術辨證思想和豐富多采的審美觀念。

「文學」一詞，首見於《論語·先進》，皇侃《論語義疏》引范甯說：「文學，謂善先王典文。」楊伯峻《論語譯注》說：「指古代文獻，即孔子所傳的《詩》《書》《易》等。」實泛指學術文化。因之，本編對於下列

〔一〕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第四章中主張「對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三者加以區別」，並稱：「似乎最好還是將『文學理論』看成是對文學的原理、文學的範疇和判斷標準等類問題的研究，並且將研究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看成『文學批評』」其批評方法基本上是靜態的（或看成文學史。當然，「文學批評」通常是兼指所有的文學理論的」。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導論》說：「一般似乎都認爲文學的研究，可以分爲兩個主要部門——文學史與文學批評——雖然有時候分成三部：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後者的分法中，「文學批評」實質上是指實際批評；這種分類至今仍未獲得普遍採納，而許多作者仍然使用「文學批評」一詞以包括理論探討與實際批評這兩者。」又據該書之注，韋勒克承認曾以更廣的意義使用 Criticism（批評）一詞以包括 literary theory（文學理論），見於其著作 Concepts of Criticism（文學批評概念）。按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第一卷《前言》中云：「『批評』這一術語我將廣泛地用來解釋以下幾個方面：它指的不僅是對個別作品和作者的評價，『判斷的』批評，實用批評，文學趣味的徵象，而且主要是指迄今爲止有關文學的原理和理論，文學的本質、創作、功能、影響，文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關係，文學的種類手段、技巧，文學的起源和歷史這些方面的思想。」

思想資料，都列於探索討論的範圍。

其一，泛論抽象之「文」者。這「文」也許概指「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也許統稱文化學術、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其中自然也包括近代意義上的文學。

其二，論說詩歌音樂者。古代詩、樂、舞三者結合，論詩、論樂常不可分。樂論中常包含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資料。

其三，評論言語文辭者。這裏包括對政教法令、交際辭命、歷史記載、論說辨難、學術著作等的寫作方法、藝術特點和文學價值的評說。

其四，其他關於自然變化、人事活動的哲理總結或寓言寄託之有啓迪於文學批評者。如《易傳》的「陰陽剛柔」、《老子》的「有無相生」之說，《莊子》的「庖犧承蜩」等故事，初非論文，却在文學批評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藝術與非藝術，文學與非文學的語言用法之間的區別是流動性的，沒有絕對的界限。美學作用可以推展到種類變化多樣的應用文字和日常言辭上。」（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文學的本質》）古今關於文學的觀念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我們編寫各個時期的文學批評歷史，試圖兼顧前代與後世的文學觀，以期比較全面地反映當時的文學批評風貌，從而尋求其發展軌轍，當然在具體實踐中是深感力不從心的。

一、文學批評的雛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中國最早的文學批評思想資料是周代寫定的。周代的文化學術已有很高的發展。相傳爲孔子編定的《五經》，被劉勰推爲各體文學創作淵源——「文章奧府」、「羣言之祖」（《文心雕龍·宗經》），大部分產生于周代。《詩經》是周詩，其中不少東西周之際的詩篇中表述了作者創作意旨和對詩歌作用的認識：「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詩·魏風·葛屨》）「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詩·魏風·園有桃》）「家父作誦，以究王誼。」（《詩·小雅·節南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詩·大雅·烝民》）等等，都是說明以詩作來抒發自己哀樂之情，對別人進行頌美或諷刺，期望它能產生感染、教育、安慰的作用，也反映了詩歌藝術的某些特徵。《尚書·堯典》記載虞舜對夔所說：「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自然不是上古時代原始文獻，但當有其較早的淵源，可算是《詩經》篇章中作者旨趣的理論概括，揭示詩歌表達情志的作用、詩歌音律的關係，開啓詩樂教育的先聲。近人朱自清云：「詩言志」說是我國詩論的「開山的綱領」（《詩言志辨》）。當初所謂「志」，應當包括思想與感情，「情志不分」，並有敘事的成份。「言志」與「緣情」分道揚鑣，是以後的事。《國語·周語上》載西周邵公諫厲王弭謗時說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晉卿趙孟參加鄭伯宴會時請陪同的七位鄭國大臣都賦詩，讓他「以觀七子之志」並加以評論，反

映周時開明統治者對詩歌在政治、社交生活中作用的重視與發揮。詩歌既可以反映，也得以觀察人情志趣，以及個人和家國的風尚、前途。從這些記載，也可窺測周王朝「采詩」的傳說有其一定真實性，並瞭解春秋時列國交往中「稱詩喻志」「斷章取義」的具體情況。

周人很早便對言辭極其重視，並注意其文采修飾。《詩·大雅·板》云：「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強調了言辭的和悅對於民衆的安定與協調的作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穆叔所聞「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爲「不朽」之說，《襄公二十五年》記古書所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成語，都證明其前人已認爲言辭具有垂諸永久的價值和對言辭的審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國語·鄭語》記西周後期史伯所云「聲一無聽，物一無文」以及《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春秋中期晏嬰對齊景公問時所強調的音樂詩歌的不同聲律、風格的相互濟和，都是爲了說明應該容納對立意見和異端言論，指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要求作到「和而不同」。這些都強烈反對藝術上的單調與政治思想上的專制。不僅反映文藝方面的樸素辯證思想，也顯示政治和學術方面的民主性因素，實爲春秋戰國之際諸子學派的興起起到鳴鑼開道作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在魯觀樂時對許多地區樂歌所作評論，分別指出其優點和不足之處，並據以推測其地之民情風俗，政治盛衰，讚揚不同的藝術風格，並大力肯定中和之美，實爲流傳至今的孔子以前最完整的文藝批評文獻。自然《左傳》作者在追記時當是有所增飾附會的。

二、諸子爭鳴與文學思想的發展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發生急劇的變革。周王朝的統治分崩離析，貴族對政治和文化學術的壟斷局面打破了，新興力量上升了。「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反映各種勢力間的劇烈競爭，知識分子階層的興起，文化的下移，思想的解放。這時湧現出許多私人學派，其創導者與繼承者各自提出自己的哲學、政治、經濟、文學主張，樹立旗幟，招收門徒，周游列國，進行游說、講學、辯論、立言著書活動，形成了歷史上艷稱的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本編所著錄的就有儒家的孔丘、孟軻、荀況，道家的老聃、莊周，墨家的墨翟和法家的商鞅、韓非等，當時都稱為「子」，後世相沿之，稱其著作為「子書」。孔、孟、老、莊之書，則更被推尊為「經」，《論語》《孟子》列於《十三經》，而《老子》《莊子》也名《道德經》《南華經》。此外，楚國屈原、宋玉的辭賦，漢人編集為《楚辭》，後居集部之首。秦相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係招致道、儒、墨、法諸子之徒集體編撰，《漢書·藝文志》稱之為「雜家」。僅舉此舉犖大者，已足覘當時文壇的羣星燦爛。

中國歷史上這一文化學術思想黃金時代的出現，和知識分子的獲得相對獨立地位有關。無論孔子的「待善價而沽」（見《論語·子罕》）、莊子的「無為有國所羈」（見《史記·本傳》），都說明人身依附關係的擺脫。孟子歸然宣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見《孟子·滕文公

下」；顏觸公然對抗齊宣王，指出：「士貴耳，王者不貴。」（見《戰國策·齊策四》）更反映對氣節人格充滿自信。有偉岸的氣概，也有卓犖的識見。儘管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墨子主「用夏政」（見《淮南子·要略》），老莊更神往於太古之世，但他們的學說，都是獨創的，容有偏勝，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言，達到相當的理論高度。明袁宏道《與張幼于》謂：「昔老子欲死聖人，莊子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先秦諸子的代表人物，多是這樣頂天立地的，故其思想光芒四射，有非秦漢以後封建專制強化的統治下知識分子所能及者。因而本編在介紹各家時，大都基本持正面的態度，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相互的否定。這並非我們在同書中觀點自相矛盾，因為諸子既各擅勝場，自非十全，諸章節單獨敘述也難面面俱到，相互配合，揚長補短，也算是向司馬遷作《史記》的「互見」之法學習吧。關於「吸取精華、批判糟粕」的原則，自應貫徹始終，却未能處處作出判斷。古書之精華糟粕，並非都涇渭分明，也貴在讀者自得。精華僵化，可能反成為教條束縛，糟粕活用，也能化腐朽為神奇。

由於先秦時學術尚未分工，諸大家大都既是哲學家、政論家，也是文學家，而且以前兩者為主。其文學思想更有不少是從他們的哲學、政治理論中生發出來的。因此，本編在對他們作評介時，有必要以一定的筆墨概括其基本哲學、政治觀點，以有機地理解其文學思想，或補綴後代有關的文學批評，認識其思想的歷史作用與影響。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在文學思想方面成就不大。其時「文」及「文

學」的含義廣泛並在政治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論哪位哲學家、政治家都須要對它表態，不管是肯定它或者否定它。他們的哲學、政治觀點都需要用文辭表達出來，他們（包括否定文學者）大都從事著作，對語言的藝術風格，文辭的審美性質、辯說論證的邏輯原理、修辭手段、接受心理以至文藝批評的標準和方法等等，都要進行探討研究，並付之實踐。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說：「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充分肯定了先秦諸子的文學成就。他們在文學批評史上作出了相應的貢獻。

近代論者每有從南北畛域區分先秦的思想與文學傾向。所謂南方，主要指跨有江漢、江淮流域的楚國，所謂北方，主要指黃河流域的三晉和齊魯，當時稱爲「中國」。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說：「從地理環境的一般情況來說：南方氣候溫暖，土地低濕，草木繁茂，山川明媚，物產豐饒，北方正與此相反，氣候寒冷，土地高燥，草木稀疏，佳勝罕見，天惠不豐。因而，南方民衆的生活比較的安逸，能有餘暇耽於南國特有的空想、冥想。由此生成的民性自然是浮華的、空想的、熱情的和詩的，所以南方的文藝思想有唯美的浪漫主義和優游逸樂的傾向。反之，北方民衆需要爲生存付出艱辛的努力，由此生成的民性自然是質樸的、現實的、理智的、散文的。所以，北方的文藝思想有功利的現實主義和質實敦樸的傾向。」這種概括，是有其識見的，但並不全面。自然地理環境祇是有影響於思想和文學